

A SERIES OF BOOKS FOR ALTAIC STUDIES

阿 尔 泰 学 丛 书

顾问 清格尔泰 主编 呼格吉勒图 双 龙

古代突厥语语法

[德国] A. 冯·加班 著

耿世民 译

呼格吉勒图 审校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A SERIES OF BOOKS FOR ALTAIC STUDIES

阿 尔 泰 学 丛 书

顾问 清格尔泰 主编 呼格吉勒图 双 龙

古代突厥语语法

[德国] A. 冯·加班 著

耿世民 译

呼格吉勒图 审校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突厥语语法/(德)冯·加班著;耿世民译,一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3.12

(阿尔泰学丛书)

ISBN 7-5311-5230-4

I. 古… II. ①冯…②耿… III. 突厥语—语法—古代 IV. H51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84694 号

该书已取得德国 Otto Harrassowitz 出版社授权

阿尔泰学丛书
古代突厥语语法

顾问/清格尔泰

主编/呼格吉勒图 双龙

著者/[德]A. 冯·加班

译者/耿世民

审校者/呼格吉勒图

出版·发行/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本/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12.625 字数:372 千

版本/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100 册

社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护城河巷 30 号

电话/(0471)6961597 邮编/010010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7-5311-5230-4/G·4751

定价(精装)/36.5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阿尔泰学丛书》总序

自 1786 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W. Jones, 1746—1794)在印度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发表论文,认为梵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方面跟希腊语和拉丁语有许多共同点并具有共同来源之后,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 1791—1867)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和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的相互比较》(1816)和《梵语、禅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古斯拉夫语、峨特语和德语比较语法》(1833),为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提出了亲属语言的关系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材料,即开创了“用一种语言阐明另一种语言,用一种语言的形式解释另一种语言的形式”的先河。经过雅各布·格里木(Jacob Grimm, 1785—1863)、奥古斯特·波特(Pott, 1802—1887)、阿达尔贝尔特·库恩(Kuhn, 1812—1881)以及麦克斯·缪勒(Max Müller, 1823—1900)、古尔替乌斯(G. Curtius, 1820—1885)、施来赫尔(Aug. Schleicher, 1821—1868)等语言学家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比较语言学成为一个新兴的语言学领域得以确立。印欧诸语言谱系树的建立以及形态学的分类都与施来赫尔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然而,德国语言学家狄兹(Diez, 1794—1876)出版《罗曼族语语法》(1836—1838)之后使比较语言学获得了真正的地位。但是,正如索绪尔批评的那样,这个时期的“比较语法在它的研究中(而且只限于印欧语系语言的研究),是从来不过问它所作的比较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所发现的关系有什么意义。它完全是比较的,而不是历史的。毫无疑问,比较是一切历史重建所必不可少的条

件。但是单靠比较不能做出结论”^①。

到了1870年前后,出现了美国的辉特尼(Whitney, 1827—1894)和德国的勃鲁格曼(K. Brugmann, 1849—1919)等新语法学派的诸多语言学家,他们出版了《印度日耳曼语比较语法纲要》(勃鲁格曼, 1886),《印度日耳曼语名词词干结构领域内的研究》(奥斯特霍夫, 1875),《印欧语言比较语法基础》(德尔布吕克, 1886)等一系列著作,开始提出:语言生命的条件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竭力反对以前的语言学家把语言的生命分为史前的增长时期和有史以来的衰老时期,要求用不允许有例外的语音演变规律和类比作用解释语言变化现象,认为语言间的对应只是语言现象的一个方面,比较只是一种手段和重建事实的方法,从而把语言的历史研究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著名语言学家瑞士学者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于1878年写出了惊人之作《论印欧系语言元音的原始系统》,并且在巴黎同他的学生梅耶(A. Meillet)和格拉蒙(M. Grammont)等语言学家共同建成了法兰西学派。在他去世以后由他的学生巴利和薛施葛等整理出版的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之所以具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除了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之外,是因为在欧洲研究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刻又提出了注重语言结构、系统和功能的研究,还把语言学划分为共时语言学和历时语言学等,奠定了语言学研究较新趋向的理论基础。特别是在这本书的第五编“回顾语言学的问题 结论”中,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进行了阐述。除此之外,梅耶的《印欧语言比较研究导论》(1903)和根据他1924年在奥斯陆演讲的稿子修订出版的《历史语言学中的比较方法》(岑麒祥汉译本,科学出版社,1957,北京)进一步用印欧语系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成果阐述了历史语言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使得历史比较语言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并使印欧语系学说在语言学界

^①参见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沙·巴利、阿·薛施葛、阿·里德林格合作编印,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第17~25页。

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和科学的肯定。近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创始人美国学者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的《语言论》(1933)“第十八章 比较法”中也系统述及了通过比较研究语言间的相似成分来确定和区分亲属语言与非亲属语言的方法。并通过对欧洲语言间的比较和重构,证明了欧洲诸语言间的亲缘关系。更为有趣的是,他竟然使用芬兰—乌戈尔语系中的日耳曼语借词作为古老日耳曼语的证据加以利用,进一步证明了日耳曼语的古老形式^①,从而丰富了比较语言学的内容和方法。

印欧语系诸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得到语言科学证明之后,语言学界把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试图应用到其他语言的谱系分类上来。譬如,“阿尔泰语言学理论”就认为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一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有的也包括日语)同属于一个语系,这些语言之间具有同源关系。但是这种假说至今尚未得到语言学界的完全肯定和认同,仍有不少学者持有相反意见或抱有怀疑态度。

其实第一位注意到突厥语、蒙古语和满洲一通古斯诸语言之间具有相似性的人是瑞典军人菲利普·约翰·冯·斯特拉伦伯格(Phillip Johann von Strahlenberg)。他在西伯利亚居住期间,收集了大量突厥语、蒙古语、芬兰—乌戈尔语和其他语言材料,1730年在斯德哥尔摩发表文章,把这些语言概括地称做“鞑靼诸语”(The Tatar Languages)^②。后来,丹麦语言学家拉斯马斯·拉斯克(Rasmus Rask)1834年提出了“斯基泰诸语”(The Scythian Languages)的术语,涵盖的语言包括前述鞑靼语和爱斯基摩语、古亚洲语、高加索语以及古代欧洲的非欧居民的语言等。随着19世纪中叶印欧比较语言学得到空前发展,麦克斯·缪勒1855年提出过“都兰诸语”(The Tulanian Languages)的术语,大体包括前述两位涉及的语言之外还增加了藏

^①参见布龙菲尔德著,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第374~403页。

^②Strahlenberg, Von P. T., Das nord-und Ostliche Thei von Europa und Asia, in-soweit das gantze Russische Reich mit Sibiren und grossen Tatarei in sich begreiffet, ect.

语、暹罗语、德拉维达语、马来亚语等一些亚洲语言。1862年出版的卡斯特伦(Castrén, 1813—1852)把芬兰—乌戈尔、萨摩亚、突厥、蒙古、满洲—通古斯等语言归结为一个语群,叫做“阿尔泰语言”^①,有的则叫做“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例如,德国学者硕特(Schott, 1853)、温克勒(Winkler, 1884)、法国学者索瓦蔗奥(Sauvageot, 1930)、芬兰学者马尔蒂·雷塞伦(Martti Räsänen, 1949)等不少学者支持和从事“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研究,发表了不少重要著作。就是在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中也出现过“乌拉尔·阿尔泰语言”这样的术语(见汉译本第320页)。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语言学家逐渐把乌拉尔·阿尔泰诸语言联系在一起,是因为这些语言之间在语音、语法和词汇等诸多方面具有较多的相似性特征。譬如在元音和谐律、构词结构的黏着性(词干+词缀)、句子的“主—宾—谓”结构、有后置词而没有前置词和冠词、有从属范畴等方面,与印欧语系诸语言相比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随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的不断深入研究,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间的有些共同性或相似性特征并不能说明它一定是原始语言的特征。索绪尔讲到:“我们已经看到,原始型的某个特征可能在某种派生的语言里已经找不到。反过来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某一语系全体代表所共有的特征竟然是原始语言所没有的。元音和谐(即一个词的后缀的所有元音的音色跟词根要素的最后一个元音发生某种同化)就是例子。在一大群流行于欧亚两洲从芬兰直到中国东北的语言——乌拉尔·阿尔泰语言里,都可以找到这种现象。但是这一极可注意的特征很可能是后来发展出来的。因此这可能是一个共同的特征而不是原有的特征,我们甚至不能引用来证明这些语言有(大可争论的)共同来源,正如不能引用它们的黏着的特征一样。人们也已承认汉语并不一直是单音节的。”^②理论上我们可以认同索绪尔的论点,但是真正考证乌拉尔—

^①Castrén, M. A., Über die Personalaffixe in den altaischen Sprachen, Petersburg, Kleine Schriften, 1862.

^②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著《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商务印书馆,1985,北京,第320~321页。

阿尔泰语言的内在亲缘关系是否存在,还要靠实证科学。乌拉尔语(芬兰—乌戈尔诸语)虽然在某些语音特征、构词方法和句法结构等方面有一定的类型上的相似特点,但在其语音对应规律和同源词汇方面共同性较少,所以把乌拉尔诸语与阿尔泰诸语看做一个语系的学者人数极少。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通芬兰—乌戈尔语和阿尔泰语言的芬兰学者兰司铁(G. J. Ramstedt, 1873—1950)^①从突厥语和蒙古语的关系着手对阿尔泰诸语言的数词^②和动词构词词缀^③和语音语法特性^④作了有意义的研究。后来他对日本語^⑤和朝鲜语^⑥也进行了研究。他不断对阿尔泰诸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工作进行综合整理,写出了《阿尔泰语中的腭音》(1932)、《阿尔泰语言中由动词演化而来的以 -j 结尾的名词》(1950)、《阿尔泰语言中由动词演化而来的以 -m 结尾的名词》(1950)、《阿尔泰语与其他语系的关系》(1947)、《卡尔梅克语辞典》(1935)等论著。特别是由兰司铁的学生本齐·阿尔托(Pentti Aalto, 1917—1998)整理出版的兰司铁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第一部:语音学,1957;第二部:形态学,1952;第三部:索引),依靠丰富的第一手语言材料,证明了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具有亲缘关系,系统阐述了突厥语

①兰司铁(G. J. Ramstedt, 1873—1950)起初是一位芬兰—乌戈尔学者,他出生在芬兰,芬兰语是他的母语,在大学里学习过匈牙利语,长期在蒙古地区调查和研究过喀尔喀蒙古语、卡尔梅克语,同时又是一位突厥学家,研究过朝鲜语和日本語。他反对把芬兰—乌戈尔语与阿尔泰语看做是一个语系。他的这种观点决非因为缺乏相关语言知识和语言学理论而形成,恰恰相反,这些得天独厚的客观条件,给他创造了建立阿尔泰学理论的条件。

②兰司铁:《论阿尔泰语数词》,JSFOu, 23, 4, 1905。

③兰司铁:《蒙古—突厥语动词词根构词学》,JSFOu, 28, 3, 1912。

④兰司铁:《论蒙古—突厥语音史》,I—II, KS, 15, 布达佩斯,1914,第134~150页;III, KS, 16, 布达佩斯,1915,第66~84页。

⑤兰司铁:《阿尔泰语和日语的比较》,《日本亚洲学会学报》,α-d ser. 1, pp. 41~54页;《日本語史》,《芬兰科学院会议报告集》,赫尔辛基,1942,第133~144页。

⑥兰司铁发表了《论朝鲜语》(1928)、《朝鲜语的名词后缀》(1933)、《朝鲜语语法》(1939)、《朝鲜语词源研究》(1949)等论著。

族、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诸语言和朝鲜语在语音与语法方面的内在亲缘关系,从而建立了“阿尔泰学理论”,使得“阿尔泰诸语言”从“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中分离出来,原有的“乌拉尔—阿尔泰语系”一分为二,变成了芬兰—乌戈尔语系(乌拉尔语系)和阿尔泰语系两个语系。

响应兰司铁“阿尔泰学理论”较早的是1923年以前在圣彼得堡(列宁格勒)大学工作的波兰学者符拉迪斯拉夫·科特维奇(Władysław Kotwicz, 1872—1944)、俄罗斯学者鲁德涅夫(А. Руднев, 1878—1958)、符拉基米尔佐夫(Б. Я. Владимирцов, 1884—1931)和匈牙利学者尤利乌斯·涅默特(Julius Németh)、冈伯茨(Gombocz)等。除了个别人,他们的大多数和兰司铁本人一样,一开始都怀疑突厥语和蒙古语等“阿尔泰诸语言”之间存在亲缘关系,但后来又逐渐相信这种关系的存在。可以说第一代从事阿尔泰学理论研究的学者除了兰司铁还要包括科特维奇和他的学生符拉基米尔佐夫。虽然说符拉基米尔佐夫基本上因袭了兰司铁的观点^①,但是科特维奇却有所不同。他除了接受兰司铁关于阿尔泰诸语言间存在着一大批共同成分(语法结构、同源词尾、词汇、语音对应关系等)的观点之外,在“阿尔泰诸语言”都来源于一个“共同阿尔泰语”或“原始阿尔泰语”的同源论方面却保留了个人意见。特别是他去世以后出版的他的《阿尔泰诸语言研究》(1953)一书,集中反映了他的观点。他认为,突厥语对蒙古语有过强烈的影响,而蒙古语又对通古斯语有过较大的影响。上述三个语族语言之间存在的相似性,可能是由于原有的结构相似加上相互接触和影响所造成的结果。

俄罗斯突厥学家巴斯卡科夫(Н. А. Баскаков, 1905—1996)是阿尔泰学理论的支持者。他在其《阿尔泰语系语言及其研究》(1981)中认为:曾经有过乌拉尔—阿尔泰语言为基础的共同体,而经过历史上的分离,形成了乌拉尔语言和阿尔泰语言。后来阿尔泰语言又经过分化形成了突厥语、蒙古语、满洲—通古斯语、朝鲜语和日本语。

^①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书面语与喀尔喀方言比较语法》,列宁格勒,1929;陈伟、陈鹏汉译本,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西宁。

美国学者鲍培(N. N. Poppe, 1897—1991)是20世纪继兰司铁之后最著名和多产的阿尔泰语言学家和蒙古语言学家。他撰写的《论阿尔泰语言的辅音系统》(1924)、《阿尔泰语和原始突厥语》(1926)、《阿尔泰语言学导论》(1965)、《阿尔泰语言比较语法》(语音学, 1960)、《蒙古语比较研究绪论》(1955)等论著不仅进一步描写了阿尔泰诸语言的概貌,而且进行了相关语言之间的历史比较研究,对阿尔泰语言学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除了上述学者外,各国还有很多有关阿尔泰学方面的学者,他们也都发表过不少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论著。可以说,阿尔泰学研究经过两个多世纪,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阿尔泰语系”的研究还远不如像印欧语系那样已经得到理论上的肯定,还有不少学者怀疑或反对阿尔泰语言学理论。例如本青(J. Benzing)^①、李盖提(L. Ligeti)^②、格伦伯赫(K. Grönbech)^③、西诺(D. Sinor)^④、罗那—塔什(A. Róna-Tas)^⑤等学者做了很多研究之后认为,目前对“阿尔泰诸语言”在语源上是否存在亲缘关系的问题做肯定的回答还为时过早。他们之中,有的先是相信阿尔泰学理论,后来提出怀疑;有的则是起初怀疑阿尔泰学理论,后来开始相信;有的则是既不肯定阿尔泰诸语言间存在发生学上的关系,又不排除存在同源关系的可能

①Benzing, J., Einführung in das Studium der altaischen Philologie und der Turkologie, Otto Harrassowitz, Wiesbaden, 1953.

②Ligeti, L., [The Review in Russian of G. D. Sanžeev, *Travnitelaya grammatika mongolskix yazikov*], Voprosii Yaikozinaniya, 5 (1955).

③Grönbech, K. and J. R. Kruger, An Introduction to Classical Mongolian, Wiesbaden, 1955.

④D. Sinor, Observations on a New Comparative Altaic Phonology, BSOAS, 26:1 (1963). Denis Sinor, Essays in Comparative Altaic Linguistics,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1990.

⑤Róna-Tas, A., An Introduction to Turkology, Szeged, Hungary, 1991. 《是共同继承的还是借用的?——论阿尔泰语言的系属问题》,陈鹏译自《语言学问题》杂志,1974年,第二期。参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研究室、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秘书处编《阿尔泰语文学论文选译》(续集),1982,第73~96页。

性,提倡做更多的研究之后再下结论。还有前面提到的波兰学者科特维奇^①、英国学者克劳森(G. Clauson)^②和德国学者多费尔(G. Doerfer)^③等学者则把阿尔泰诸语言间的共同成分看做是互借或相互影响的结果,从而认为突厥语、蒙古语和满洲一通古斯语等语言之间不存在发生学上的同源关系,只存在类型学上的相似性。他们的一个重要根据就是蒙古语和突厥语等语言之间不存在数词的共同性和一些基本词汇的同源性。

人们运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和理论证明了印欧语系,同时印欧语系的确立反过来又证明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科学性。随着现代语言科学的不断发展,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从事和关注阿尔泰语言学理论的人也越来越多。1957年在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24届国际东方学会议(24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Orientalists)上决定建立常设国际阿尔泰学会议(The 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以来,坚持每年召开一次国际阿尔泰学会议,截止2003年已经召开46届国际阿尔泰学会议,大大推动了国际阿尔泰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此外,在中国、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匈牙利、芬兰、韩国、土耳其、蒙古等不少国家先后成立了阿尔泰学研究机构或学术团体,有的学术团体还定期召开国际性或地区性阿尔泰学学术会议,创办阿尔泰学研究杂志,在世界范围内阿尔泰学研究日益活跃。

阿尔泰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广袤的中北亚地区,也有少数分布在欧洲。操用阿尔泰语系诸语言的人口不包括日本大约有1亿人口左右。究竟有多少民族语言属于阿尔泰语系语言,由于在划分语系、语族、语言和方言等各个层面上均存在不同观点,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意见,因此难以提供确切的数字。根据多数学者的意见和最新的观

①Kotwicz, W., *Studia nad Yezikami altajskimi*, Wyd. Marian Lewicki, Ro, 16, 1953.

②Clauson, Sir G., *The Case against the Altaic Theory*, CAJ, 2 (1956).

③Doerfer Gerhard: *Türkische und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Bd. I: *Mongolische Elemente im Neupersischen*, Wiesbaden, 1963.

点,阿尔泰语系语言大概有四十多近五十种语言,其中包括:突厥语族语言近二十种(维吾尔语、乌孜别克语、西部裕固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卡拉卡尔帕克语、诺盖语、塔塔尔语、巴什基尔语、库慕克语、撒拉语、土耳其语、阿塞拜疆语、土库曼语、阿尔泰语、图瓦语、哈卡斯语、雅库特语、楚瓦什语和其他一些语言),蒙古语族语言9种(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卡尔梅克语、达斡尔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莫戈勒语),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13种(满语、锡伯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涅基达尔语、埃文语、埃文基语、赫哲语、那乃语、乌利奇语、奥罗克语、奥罗奇语、乌德盖语等),此外还有朝鲜语和日语等^①。我国阿尔泰语系语言非常丰富,覆盖了整个阿尔泰语系语言的各个语族,其中属于突厥语族语言的有:维吾尔语、哈萨克语、柯尔克孜语、乌孜别克语、塔塔尔语、西部裕固语、撒拉语、图瓦语等;属于蒙古语族语言的有:蒙古语、达斡尔语、土族语、东乡语、保安语、东部裕固语等;属于满洲—通古斯语族语言的有:满语、锡伯语、赫哲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等;另外还有朝鲜语。

我国作为阿尔泰语系诸民族的发祥地,突厥语族、蒙古语族、满洲—通古斯语族等阿尔泰语系诸语族语言及朝鲜语的研究都有较长的历史,涌现了清格尔泰(Chenggeltei)教授、耿世民教授等一批著名学者。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在老一辈学者的培养下,一大批中青年学者迅速成长。北京、内蒙古、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青海、甘肃等省、市、自治区成为我国开展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出版了《蒙古语族语言方言研究丛书》(共21本)、《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阿尔泰语言学导论》、《现代蒙古语语法》、《维吾尔语语法》、《满语语法》等书。但是从整体上看,多数学者所从事的是单一语言的描写研究或同一语族内部的比较研究,真正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开展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比较研究的成果为数甚少。为了推动我国阿尔泰学事业的发展,为了借鉴国外阿尔泰学研究成果,为了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为了迎接国内外阿尔泰学研究新高潮的

^①这里并没有列举匈奴语、古突厥语、回鹘语、察哈台语、契丹语、女真语和现代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有密切关系的古代语言。

到来,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阿尔泰学丛书》。这是一个英明而富有远见的决定,是一个学术界值得庆贺的喜事。

《阿尔泰学丛书》将包括:(1)有关阿尔泰语系诸语言比较研究或相关语言描写研究的著作、译著和论文集;(2)相关语言的文献资料;(3)相关语言或方言的实地调查材料;(4)有关阿尔泰语系语言研究的信息资料等。该系列丛书将根据情况陆续出版。由于本丛书学术性强、排版录入校对难等各种原因,不免出现各种差错,请读者予以指正。

最后,希望该系列丛书能为阿尔泰学教学和科研工作起到参考作用,也希望为我国阿尔泰学的发展、为国际阿尔泰学的进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呼格吉勒图

2004年5月22日于内蒙古大学

汉译本序言

(冯·加班教授简介)

安娜玛丽·冯·加班(Annemarie von Gabain)教授(汉文名字为葛玛丽,世界突厥学界一般尊称之为 Maryam Apa——玛丽亚妈妈),德国人^①,是当代世界突厥学的泰斗。她毕生从事于突厥语,特别是古代突厥语和古代维吾尔语文献以及我国新疆历史、文化、宗教、艺术的研究,撰有这方面的专著数十部,论文二、三百余篇(包括重要的书评)。她因专心于科学研究工作,一生未曾结婚。退休前,葛玛丽教授是西德汉堡大学突厥学和中亚佛教学教授,曾长期担任德国乌拉尔—阿尔泰学学会(Societas Uralo-Altaica)理事长、《乌拉尔—阿尔泰学年鉴》(Ural-altaische Jahrbuecher)主编的工作。因其在突厥学方面的卓越贡献,曾多次受聘到土耳其、日本等国担任教学工作。1971年荣获国际阿尔泰学常设会议(PIAC)的金质奖章。

葛玛丽教授于1901年7月4日生于Moerchingen(今属法国)。少年时期随军(其父是德国将军)就读于德国梅因茨(Mainz)、布兰登堡(Brandenburg)等地的小学和中学。1920年中学毕业后,先入科技大学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后转入柏林大学跟威里·邦格(Willi Bang)学习突厥比较语言学,跟奥托·费兰克(Otto Franke)学习汉学,之后又随缪勒(F. W. K. Mueller)学习佛教学。1926年获博士学位。后入德国科学院专门从事我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古代维吾尔文献的解读研

^①葛玛丽教授已于1993年1月15日在柏林去世。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1992年秋天,当我从美国去德国领取德国洪堡基金会颁发的“世界知名学者奖”时,柏林科学院吐鲁番研究中心的茨木教授曾陪同我专门到柏林郊区一所养老院看望了她老人家,并合影留念。

研究工作(20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曾先后四次派考古队到我国新疆吐鲁番、库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工作,拿走了大量新疆古代写本和艺术品)。早在1929—1934年期间,她就和她的老师邦格一起刊布了六卷《古代突厥语吐鲁番文献研究》(Tuerkische Turfan—Texte),其中研究了用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佛教和摩尼教文献。与此同时发表了《回鹘文摩尼教中有关风神的残卷》(Ein uigurisches Fragment ueber den manichaeischen Windgott)(1928年)、《回鹘文残卷研究》(Uigurische Studien)(1930年)等论文。1931年她到中国北京研究了1930年我国袁复礼教授从新疆携归的,保存在北京图书馆的回鹘文《玄奘传》。1933年她研究了保存在巴黎吉梅(Guimet)博物馆的另一部分回鹘文《玄奘传》。于1935年发表了《回鹘文玄奘传第五卷研究》,1938年发表了《回鹘文玄奘传中的书信》等研究成果。

上述对回鹘文献的研究工作,为她后来撰写的划时代著作《古代突厥语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1年出版了此书的第一版。由于它是历史上第一部古代突厥语语法,且取材丰富,论述具体明了,非常实用,所以立即为作者赢得了声誉。1950年出版了该书的第二版,1974年出版了第三版。此书至今尚不失为学习研究古代突厥语,古代维吾尔语的基本参考书。

葛玛丽教授在主要从事古代突厥语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对现代诸突厥语的研究。例如早在四十年代她就发表了《现代乌孜别克语法》(Uzbekische Grammatik)一书(1945年)。此外她对现代诸突厥民族的民间文学(民歌、史诗等)也有浓厚兴趣。

在战后物质生活和图书资料十分匮乏的情况下(1946年她迁居德国南部上巴伐利亚农村居住),她仍然坚持研究工作(例如下面提到的《弥勒会见记》的研究工作主要完成于这一时期)。1949年起她在汉堡大学担任教学工作。五十年代期间,她先后发表了《古代突厥语吐鲁番文献研究》第八卷(1954年)、第九卷(1956年)、第十卷(1958年)。1957年她影印刊布了大战期间从柏林运出、战后存于西德梅因茨市的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此为用古代维吾尔语写成的佛教原始剧本)(附有研究说明一册)。1961年她又发现和影印刊布了保存在东柏林的此书的另一部分(也附有研究说明一册)。

此外,她为国际权威著作《突厥语文学基础(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撰写的《古代突厥文学》(1964年)、《古代库蛮文学》(1964年)等专文中则综合论述了古代突厥文学的发展。

葛玛丽教授不仅是突厥语文学家,而且也是突厥史,特别是文化史方面的专家。早在四十年代末她就发表了诸如《古代突厥人生活中城市的作用》(1949年)、《维吾尔人的早期历史》、《突厥人中的佛教》(1954年)等重要论文。从六十年代起,她更积极从事古代吐鲁番地区的物质文化、宗教和艺术的研究工作。在这方面先后发表了诸如《高昌回鹘王国》(1961年)、《古代吐鲁番地区的印刷业》(1967年)、《高昌回鹘王国的生活》(1973年)、《中亚对地藏菩萨的崇拜》(1973年)、《中亚学导论》(1979年)等重要著作。

这里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葛玛丽教授不仅学问渊博,而且更令人钦佩的是人品高尚、无私、乐于助人等高贵品质,更值得我们学习。

最后还应该提到的是:在长期的教学活动中,葛玛丽教授为德国和其他国家培养出了一批突厥学家,其中一些已成为现代国际上知名的学者,如日本的护雅夫教授、丹麦的阿斯木森教授(J. P. Asmussen)、土耳其的西那斯·特肯(S. Tekin)教授、美国的劳德茨尔陶乌塔斯(I. Laude—Cirtautas)教授以及德国的罗尔邦(K. Roehrborn)教授等都是她五十年代汉堡大学时期的学生。

葛玛丽教授不顾年迈和路途遥远,于1982年秋受我国政府的邀请访问了北京、新疆,实现了她青年时代的梦想。这次中国之行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在中国期间做了学术报告,为我国突厥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最后希望葛玛丽教授《古代突厥语语法》一书汉译本的出版,有助于我国阿尔泰学和突厥学的进一步发展。

耿世民

序于中央民族大学

2004年6月30日

第一版序言

多年来我从事于回鹘(古代维吾尔)写本收集品的研究,我要感谢引导我进入突厥语言学,特别是回鹘语言学的敬爱的已故导师威·邦格(W. Bang)先生,他博大的胸怀,对从亚洲到欧洲诸突厥语渊博的知识都使人感到上他的课是一种享受。我在突厥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和他的教导分不开的。遗憾的是我的这本《古代突厥语语法》已不能得到他的批评指教,学术上的进步需要来自他方的批评指正。在 V. Thomsen, W. Radloff 二人奠基性的工作后,在诸如 F. W. K. Müller, A. V. Le Cog, W. Bang, Malov, Kotwicz, Samoilowicz, Ramstedt, K. Grønbech, Foy, Nemeth, Rahmeti 等人的研究后,本书力图达到现代这一学科已经达到的水平,希望能得到专家们的指正,本书的每一章都值得做专题研究。我之所以敢于把此书献给学术界,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只有这方面做出初步概述后,才能显示出我们在对古代突厥语的认识上尚存在哪些不足之处,我们在研究其他突厥语方面应特别注意些什么。这个最古的突厥方言可能引起阿尔泰语言学家和其他一般语言学家的兴趣,像木制管弦乐对 Anton Bruckner 和对贝多芬所起的完全不同效用一样,一些语法现象对一个日耳曼语言学家来说可能与对一个突厥语言学家不一样。所以希望大家对本书中使用的语法术语要有保留地对待,其确切定义只能从例子中得出。

感谢德国科学院使我能较长期地安心于研究工作,柏林是个理想的进行科研的地方,那里集中了一批各方面的专家,我可以随时请教他们,特别要感谢 R. Hartmann, Kowalski, Schaeder 等教授的指正。感谢 Siegling 教授和 Hansen 博士对吐火罗语和伊兰语借词诠释方面的帮助。